

春秋时宋国与楚国的泓水之战，宋国虽然在兵力对比上处于劣势，但却具有凭借泓水之险的地理优势。当时是冬十一月，天气寒冷，楚军天明后在冷水中渡河，宋军如果能利用自己的优势，借楚军的大意，不失战机，先发制人，是可以打败楚军的。但当时亲自率军的宋国国君宋襄公却对敌人讲仁义，因此遭到残败。后人评论宋襄公，观点不一，不少论者认为宋襄公“愚不可及”。而《春秋公羊传》的作者公羊高和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却对宋襄公给以很高的评价。这两个人都是历史上圣贤一级的人物，他们为什么赞扬宋襄公呢？

我们先看看泓水之战的情况。据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》记载：“冬十一月己巳朔，宋公及楚人战于泓。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济。司马曰：‘彼众我寡，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。’公曰：‘不可。’既济而未成列，又以告。公曰：‘未可。’既陈而后击之，宋师败绩。公伤股，门官歼焉。国人皆咎公。公曰：‘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。’”

这段记载说的是：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初一日，宋襄公率军与楚军在泓水边作战。宋军已经排成队列，而楚军还没有全部渡河。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：“敌众我寡，趁他们没有全部渡河，请下令攻击他们。”宋襄公说：“对方还没有全部渡河，不行。”楚军渡河后还没有排开阵势，司马公孙固又请求趁机攻击敌人。宋襄公说：“还不行。”两次失去战机，等楚军摆好了阵势，宋襄公才下令进攻。最后宋军被打得大败，宋襄公大腿受箭伤，跟随宋襄公的卿大夫子弟护卫的被歼灭。人们责怪宋襄公对敌人讲仁义。宋襄公说：“君子不两次伤害敌人，不擒捉头发花白的敌人。古代的作战，不靠关塞险阻取胜。寡人虽然是殷商亡国的后裔，也不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。”

后世多评论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对敌人讲仁义太愚蠢了。而战国时的公羊高在其所著的《春秋公羊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》中却盛赞宋襄公曰：“君子大（敬的意思）其不鼓不成列，临大事而不忘大节，有君而无臣，以为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。”其中的“文王”指周文王；商周时期打仗讲究出“礼义之兵”，“成列而鼓”（双方都摆好阵势再开始击鼓向敌人发起攻击），所以公羊高称赞宋襄公的礼义，“即使周文王打仗也不过如此”。西汉司马迁在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中同样给宋襄公以很高的评价：“襄公既败于泓，而君子或以多（高的意思），伤中国阙（同“缺”）礼义，襄之也，宋襄之有礼让也。”（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吃了败仗之后，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，在人们伤感礼义缺失之时，宋襄公却秉持礼的精神，值得称赞。因为宋襄公具有礼让精神）。

到底应该怎样看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呢？如果撇开历史背景，单以胜负评论泓水之战，宋襄公因为对敌人讲仁义而遭到那样的残败，的确是愚蠢到家了。然而，我们想一想，宋襄公如果是这样愚蠢的人，怎样做一国之主，而且是春秋时五霸之一呢？公羊高和司马迁如果没有充分根据，怎么会也那样“愚蠢”地评价宋襄公呢？

评价历史人物，不能不讲当时的时代情况而抛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。原来，在宋襄公所处的春秋时期，虽然“礼崩乐坏”，但商周之礼对人们的约束还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。那时候，人们都要按礼仪行事，遵守战争传统规矩的风气仍然很浓。所以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成就了“礼仪之邦”的称谓。

我国记载从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作战原则的重要兵书《司马法》曰：“以礼为固，以仁为胜，既胜之后，其教可复，是以君子贵之也。”意思是说：以礼制为规范，军队就能巩固，以仁义为宗旨，就能战胜敌人。用这种方法，取胜以后还可以反复运

文化视野

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的宋襄公

□ 刘秀森

用，因而贤德的人都很看重这种方法。《司马法》又说：“古者，逐奔不过百步，纵绥不过三舍，是以明其礼也。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，是以明其仁也。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。争义不争利，是以明其义也。又能舍服，是以明其勇也。”意思是：古时候的战争，追击溃逃的敌人不能超过一百步，追踪主动退却的敌人不超过九十里，这是为了表示礼让；不残杀丧失战斗力的敌人，并哀怜他们的伤病人员，这是为了表示仁义；等敌人布阵完后后再发起进攻，这是为了表示诚信。争大义而不争小利，这是为了表示战争的正义性。赦免降服的敌人，这是表明自己

军队发布的训令，内容还包括在战争中遇到对方身分高的人，尤其是遇到敌军的统帅时，普通士兵一定要下车致敬；若是敌军统帅在逃跑，追赶的人一定不能不择手段地追杀；对待敌国的君主主要像对待本国的君主一样尊敬。但到了春秋中后期，“礼崩乐坏”导致战争由信奉“军礼”转变为“诡道”。这说明，在历史的演进中，战争经历了由温和到残酷，由“宗仁尚义”到“唯力是尚”的变化。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云：“古之伐国，不杀黄口，不获二毛，于古为义。”战争从春秋之前到春秋时期的“道义化”、“温和化”逐渐演变为诡诈，乃至杀人盈城、流血千



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。

常文化 绘图

里，也从侧面证明了孔子对“礼崩乐坏”感喟的原因。周人虽然不能不依赖武力巩固其统治，但他们毕竟是具有高度的文化教养；在他们的价值系统中，赤裸裸地“以力服人”是最不足取的。因此虽属征战之事，也必须“文之以礼乐”。传统的战争礼仪是秦国开始破坏的。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记载：“彼秦者，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。”《战国策》云：“秦，虎狼之国也，无礼义之心。”其次是楚国不讲仁义，被称为“蛮夷之国”。但在诸侯国中，战争遵守礼仪之风仍然没有全部改变，“不鼓不成列”仍然是一些诸侯国遵守的规则。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就是这样遵守的。

春秋时诸侯国的人们在战争中讲仁义，有不少实例。如：在交战过程中见到对方的国君不但不能攻击，而且必须行礼，然后才可以继续找其他对象胜负。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就记载，晋国和楚的鄢陵之战：“郤至三遇楚子之卒，见楚子，必下，免胄而趋风。楚子使工尹襄问（慰问）之以弓，曰：‘方事之殷也，有秣韦之附注，君子也。识见不谷而趋，无乃伤乎？’郤至见客，免胄承命，曰：‘君之外臣至，从寡君之戎事，以君之灵，间蒙甲冑，不敢拜命，敢告不宁君命之辱，为事之故，敢肃使者。’三肃使者而

里，也从侧面证明了孔子对“礼崩乐坏”感喟的原因。周人虽然不能不依赖武力巩固其统治，但他们毕竟是具有高度的文化教养；在他们的价值系统中，赤裸裸地“以力服人”是最不足取的。因此虽属征战之事，也必须“文之以礼乐”。传统的战争礼仪是秦国开始破坏的。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记载：“彼秦者，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。”《战国策》云：“秦，虎狼之国也，无礼义之心。”其次是楚国不讲仁义，被称为“蛮夷之国”。但在诸侯国中，战争遵守礼仪之风仍然没有全部改变，“不鼓不成列”仍然是一些诸侯国遵守的规则。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就是这样遵守的。

春秋时诸侯国的人们在战争中讲仁义，有不少实例。如：在交战过程中见到对方的国君不但不能攻击，而且必须行礼，然后才可以继续找其他对象胜负。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就记载，晋国和楚的鄢陵之战：“郤至三遇楚子之卒，见楚子，必下，免胄而趋风。楚子使工尹襄问（慰问）之以弓，曰：‘方事之殷也，有秣韦之附注，君子也。识见不谷而趋，无乃伤乎？’郤至见客，免胄承命，曰：‘君之外臣至，从寡君之戎事，以君之灵，间蒙甲冑，不敢拜命，敢告不宁君命之辱，为事之故，敢肃使者。’三肃使者而

里，也从侧面证明了孔子对“礼崩乐坏”感喟的原因。周人虽然不能不依赖武力巩固其统治，但他们毕竟是具有高度的文化教养；在他们的价值系统中，赤裸裸地“以力服人”是最不足取的。因此虽属征战之事，也必须“文之以礼乐”。传统的战争礼仪是秦国开始破坏的。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记载：“彼秦者，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。”《战国策》云：“秦，虎狼之国也，无礼义之心。”其次是楚国不讲仁义，被称为“蛮夷之国”。但在诸侯国中，战争遵守礼仪之风仍然没有全部改变，“不鼓不成列”仍然是一些诸侯国遵守的规则。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就是这样遵守的。

退。”意思是：晋军主将郤至三次碰到楚共王的亲兵，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要下车，脱下头盔行礼，疾走如风。楚共王很高兴，派工尹襄送上一张弓去问候，说：“正当战事激烈的时候，有一位身穿金黄色牛皮军服的人，他是个君子啊！刚才见到我脱帽行礼，快步行走，他莫非是受伤了？”郤至见到来问候的人，脱下头盔接受楚共王的问候，说：“贵国君王的外臣郤至跟随着寡君来作战，托君王的福，参与了披戴铠甲和头盔的行列，所以无法箭受君王慰劳的旨意。谨向君王报告没有受伤，对于君王的惠赐，我感到惭愧。由于战事的缘故，谨向使者敬礼。”于是，三次向使者行肃拜之礼以后才退去，找别人对夫去了。《春秋公羊传》中说的“有君而无臣”就是这个意思。当时的战争就是如此地遵礼。

再如，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记载，楚国侵略宋国包围了睢阳，晋国为救宋国，用计策使楚国的附国曹国、卫国与楚国断绝邦交，楚军元帅“子玉怒，从晋师。晋师退。军吏曰：‘以君辟臣，辱也。且楚师老矣，何故退？’”子玉发怒，追逐晋军。晋军撤退。军吏说：“以国君（指晋文公）而躲避晋公（楚国的臣下子玉），这是耻辱。”这是宋襄公的儿子宋成公时期的事，可见当时“有君而无臣”的战争礼仪在诸侯国中仍没完全失去其规范意义。

在宋成公后四代宋元公时，宋国的“华向之乱”中，叛军战将华豹和平叛的公子成相遇，华豹一箭从公子城的耳边穿过；当华豹正准备射出第二箭时，公子成大喊：“你已经射出一箭让我受伤了，这时候还不让我还击，你这种行为真是太卑鄙了！”华豹立刻觉得自己没遵守礼仪，于是放下手中的剑，等着公子成回击。可见战争礼仪在宋襄公之后的宋成公时仍没有完全消失。

当时的战争还有一条原则：如果对方逃跑，追进中不能乘人之危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记载：“晋人以广队不能进，楚人恭之脱肩，少进，马还，又恭之拔旆投衡，乃出。”（晋国与楚国打仗的时候，晋国人败逃时有战车陷在坑里不能前进，在后追击的楚军竟然教他们抽出车前横木，让他们再逃；没走多远，晋人的马盘旋不能前进，在后追击的楚军竟然又教他们拔掉大旗，扔掉车轅头上的横木，这样晋人才逃了出去。）

据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记载：“狂狡杀郑人，郑人入于井，倒戟而出之，获狂狡。”郑国的公子归生受楚国的命令进攻宋国，宋国的华元、乐吕率军抵抗，双方在棘陵展开战争。开始时，宋军将郑军击败，郑军将士逃跑。宋国的狂狡在追赶郑国军队的一个将领时，郑国的将领皇甫嵩落入田野里的一口井中。狂狡觉得如果落石下并击死对方不合礼仪，便把戟倒过来伸到井里，让那人抓住戟柄上来再战。

鲁昭公二十七年（公元前517年），吴王僚发兵攻打楚国，两军在穷邑一带展开激战。吴国军队节节败退，楚国工尹商阳指挥战车追赶败军，陈弃疾为御者。商阳的战车追上吴国的败兵，却迟迟不肯引弓射箭，陈弃疾说：“追杀吴军是楚王的命令，不能怠慢，您何以引弓射箭了！”商阳慢慢从弓囊之中取出弓，但却引而不发。陈弃疾又催，商阳放箭射杀一个吴兵，就把弓收回弓囊。又追上几个吴国的败兵时，陈弃疾催促商阳赶

紧放箭，商阳再次引弓射箭，又射杀两个吴兵。每射杀一个吴兵，商阳都要下车亲自去把死者的眼睛合上。连续射杀三个吴兵后，高阳就命令陈弃疾停止追赶，说：“射杀三个吴兵就可以交差了，没有必要穷追猛打，再射杀更多的人了。”

以上战例说明，传统的战争礼仪虽然由秦国率先破坏，但在春秋时期的战争中还是在一些诸侯国中被遵守的。这是后来人、尤其是今人不可理解的。但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这样。古人有古人的道理，不能以今人的道理衡量古人。

在春秋中、末期，人们对传统的战争礼仪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的态度。据《左传》等史籍记载，泓水之战以宋军的残败告终，宋襄公受伤，多亏司马公孙固将他救出；又多亏宋襄公的哥哥目夷从睢阳率军前来接应，杀退追赶的楚军，宋襄公才逃回了睢阳。当时宋襄公身边的人责备宋襄公不该在作战时对敌人讲仁义。而宋襄公却阐述应该遵守的战争礼仪说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（擒）二毛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。”他的哥哥目夷反驳他说：“君未知战。刚敌之人，随而不列，天赞我也。阻而鼓之，不亦可乎？犹有惧焉。且今之勃者，皆吾敌也。虽及胡者，获则取之，何有于二毛？明耻教战，求杀敌也。伤未及死，如何勿重？若爱重伤，则如勿伤；爱其二毛，则如服焉。三军以利用也，军鼓以声气也。利而用之，阻隘可也；声盛致志，鼓儆可也。”（“主公不懂得作战。强大的敌人，因地势险阻而未成阵势，这是上天帮助我们；阻碍并攻击他们，也不可以吗？还有什么害怕的呢？而且当时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。即使是年纪很大的，能俘虏就抓回来，还管什么头发斑白的敌人？明耻以鼓舞战斗的勇气，教战使掌握战斗的方法，就是为了杀死敌人。敌人受伤却还没有死，为什么不能再杀伤他们？如果怜惜敌人不愿再去伤害受伤的敌人，不如一开始就不伤害他们；怜惜头发斑白的敌人，不如对敌人屈服。军队凭借有利的时机而行动，锣鼓用以鼓舞士兵的勇气。利用有利的时机，敌人遇到险阻，我们可以进攻。声气充沛盛大，增强士兵的战斗意志，攻击未成列的敌人是可以的。”）

由此可见，战争在历史的演进中经过“宗仁尚义”到“唯力是尚”的变化，在春秋中后期，人们对传统的战争礼仪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的态度。

泓水之战时，正在这种变化的进程中，“宗仁尚义”的礼仪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，而唯杀敌是尚已经开始登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充当战争角色的人们，尤其是军队的首领，面临两种观念的选择。而在敌方已经放弃了仁义的情况下，一向遵行仁义的宋襄公仍然选择了仁义。在当和之后的战争中，似宋襄公这样选择的也屡见不鲜。孔子说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（《论语》）孟子说：“生，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依儒家的观点来看，宋襄公虽败犹荣。所以，君子对春秋时仁义的缺失十分伤感、忧虑，感叹社会风气日下。因此公羊高对宋襄公“临大事而不忘大礼”十分称赞，司马迁作《史记》也对宋襄公坚持仁义“褒之也”。他们认为“宗仁尚义”不应该被抛弃，过去的好东西被丢掉是莫大的悲哀。

仔细分析，目夷的“明耻教战，求杀敌也”也不尽全面。明辱教战，除“杀敌”之外，也不可忽视化敌的巨大作用，分化和争取敌人，也是取胜的一大策略。战争中不忘行仁义，是分化和争取敌人的重要方法。行此，在很多时候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，既可取得战争胜利，也大大减少了自己军队的伤亡。

文艺评论

正气沛然 诗心悠悠

——读彭浩诗诗集《逆时溯源》

□ 杨石

展读彭浩的第二本诗诗集《逆时溯源》，入手其内，出乎其外，感知到其诗的温润，领略到其诗的意趣，分享了诗人的思想气质、人格风采、诗才性情和精神魅力。

彭浩自出版第一本诗集《灵泉泪泪》已降，六载有余。他怀着对文学的敬畏，怀着对新时代、对诗歌的热烈而深沉的爱，蓄积诗思，提炼诗意，磨砺诗艺，终有新的收获，出版了涵盖时光、状物、行吟、杂感、抒情五部分计119首诗歌的第二本诗集，内涵弥漫着真善美的气息，展示了诗人的高远情怀和诗歌的不俗意境。

唐代诗人刘禹锡云：“心源为炉，笔端为炭。”意谓诗意如炉火，下笔时如炉中加炭，诗作可成。彭浩创作的实践，亦验证了此话语之有理。他观照生机勃勃的新时代，观照变动不居的现实，对共产党、对人民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富有真挚的情感、博大的情怀，因之胸中便涌起诗思的潮水，于激情澎湃之中思绪飞扬起来。《公仆与学生》《五月的赞颂》《雷锋，雷锋》《逆行者的的心愿》《今天，商丘呼唤长江》《汇聚的力量》等堪为佳作。比如，被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采用的《逆行者的的心愿》，这样讴歌奔赴武汉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：“为什么彻夜无眠/为什么泪流满面/有一种精神是奉献/有一种行动叫勇敢——呈现一种动人的氛围/有谁不愿岁月静好/谁不盼阖家团圆/同样懂儿女情长/同样恋膝膝之欢”——层层铺垫，衬托白衣天使的无私奉献精神；“任务召唤，使命在肩/挥泪别亲，星夜驰援/任道途——湖北武汉/战场在——抗疫一线”——彰显逆行者的义无反顾的果敢行为。那么，他们的心愿是什么呢？“让病毒不再扩

散/让患者重展笑颜/让世界依然温暖/让家园永远平安”——揭示逆行者美丽的内心世界与家国情怀，令人动容，令人起敬。《汇聚的力量》同样写得热情洋溢，句句铿锵：“无论时光如何流转/无论脚步如何匆忙/我们的初心永远不变/始终把为人民服务铭记心上/生命至上，人民至上/我们从容面对所有的惊涛骇浪/……在新长征路上，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”——汪洋恣肆，诗遇行云，显示出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彭浩的诗歌富有哲理，耐人品味。他以积极的人生姿态，对现实社会用心体验，对过往历史认真反思，对真实人性仔细探索，对生命价值冷静追问，将更多的理性成分熔铸进诗歌里，因此便有了鲜明的审视意味、哲思意味，折射出诗歌语言的张力。而他写在习近平同志批示学习李学生十周年之际的《公仆与学生》，便是闪耀着思想光芒的代表作。“公仆与学生/完成了一场心灵的共鸣/学生与公仆/透着一样的质朴和谦恭/……只要在人民面前做学生/只要为人民利益肯牺牲/无论十年还是百年/光明的仍在光明/永恒的总会永恒”——生发开去，升华思想，读来诗香满口，余韵满怀。“不敢与人对视/有料吃就好/摇尾乞怜或卖弄美色”（《池鱼》）；“无论你待见与否/什么总是血脉偾张”（《香椿的春天》）；“大海什么颜色/应完全取决于大海/它不需要看人的眼色”（《大海的颜色》）；“在城市的上空/在历史的天空/我的四周大海汹涌/一只只苍鹰划过苍穹”（《清明，南京》）；“无论春秋还是冬夏/绚烂抑或静美/只要有爱/就会如诗如画”（《叶子黄了》）；“只需走进竹林深处/听花开花落/叹岁月如歌”（《在东坝头》）等等，

诗有意境，底蕴丰厚，耐人寻味，启人心智。

孟子曰：“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彭浩继承中华文明的传统，致力做个思想者。他热诚地观察生活，体验人生，审视自我，发现自我，将“我”的独特感悟写进诗里，释放情感，放飞自我，在诗歌中呈现出诗人的镜像。“你枝蔓茂盛/无果而终/我生而为人/仍执着于开花结果”（《与花儿语》），这折射出“我”对事业有所建树的渴望与追求；“一次次叮叮/叮出一个个的包/感谢它们/让我还认识我”（《感谢蚊虫叮咬》），这是自我敲响警钟，清醒地认识自己，我还是个凡人，绝不可以忘乎所以；“每个人都给我力量/没有谁面目可憎/只需让他们表达/我需要的倾听/以海一样的胸怀/去听海浪的声音”（《寂寞的夜里不孤单》），这是自我告诫，只有持如此豁达大度的积极的人生态度，才能博采众长不断汲取前行的力量。诚然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也许会有人不理解你，也许会有人误会你，也许会有人算计你，也许会与人磕磕碰碰，那该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呢？诗歌《做自己》给出了答案：“我会坚守内心的底气/我会接受岁月的磨砺/我会珍惜蜕变的外衣/我会走出墙角的孤寂”。那么，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？“为了做人的站立/为了宝剑的锋利/为了梦想的绮丽/为了英雄的传奇”，情感迸发，酣畅淋漓，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情感共振和心灵共鸣，从而发挥了诗歌的教化功能。

彭浩不仅把目光投射到自我内心的格局，还打开眼界，关注到更为广袤的天地，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，杂糅多元的艺术方法，创作出深沉、激越的诗歌。“每座山都有

眼睛和表情/山和水每天都在对话/这是炼丹飘出的朵朵丹霞/太阳终会叹息自己的老去”（《走进龙虎山》），此处将山和水当做人来写，情趣盎然；“您虽称醉翁/如果您不做太守/你就是我的老弟/我就是你的老兄/……趁清风月明/相聚农家的小亭/待酒过三巡/你我道心声/……激情总不仗酒点燃/与民同乐方乐在其中”（《醉情醉翁亭》）。瞧瞧，诗人游醉翁亭，居然与古代大家欧阳修对饮、畅谈，想象极其丰富，是真够浪漫的；“三清山上不见仙/登至顶峰问青天/且拿诗酒酌春色/但恐醉卧神女边”（《春游三清山》）。诗人思绪飞

扬，天马行空，情趣横生，如梦如幻。如此，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结合，便是诗歌的艺术魅力之所在。

有论者言，要倡导和鼓励精英诗与大众诗共生共荣。彭浩以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核心思想为指引，在上述两个方面均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。然而，当下的诗人诗歌语言晦涩艰深、古典难懂、令人迷茫。对此诗家当有所警惕。这个温馨的提醒，对于彭浩先生也许是多余的。期盼他继续踏着时代的鼓点，一路走出诗歌创作的别样风景。



12月12日，在夏邑县罗庄镇汉梁王酒业有限公司，大家济济一堂，共同见证了“汉梁王酒文化杯”故事传说及广告语征集颁奖盛典。据了解，这次汉梁王酒文化杯故事传说和广告语征集活动，历时两个多月，参与投稿的作者750多人，涉及全国20多个省(市、区)。这次活动不仅提高了夏邑知名度，更是全县文艺事业与企业文化融合的尝试。本报记者 韩丰摄